

毛泽东谈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 刘明钢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明大会的方针，并简要地回忆了中共一大的情况：“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一大许多原始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记忆日益模糊，以致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中共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1937年，中共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安静的环境。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中央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他首次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



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预备会议的报告中说：“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

关于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最终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两份重要文件。这些档案原件也都未能保存下来。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两个文献的内容，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参加大会的有“12个代表”。实际上，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外，参会的代表有13人。于是，包惠僧是否是中共一大代表曾经引起一场激烈的讨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参加大会的代表当时活着的共产党员还有3个人（叛变了如张国焘之流不算），分别是毛泽东本人、董必武和陈潭秋，但实际上陈潭秋已经牺牲。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延安当时并不知道陈潭秋牺牲了，所以毛泽东说：“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并且在党的七

大上，陈潭秋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讲到他本人填表的情况。这是其他一大代表都没有提及的事情，引起了党史工作者的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先出现在上海。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首批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人，陈独秀为书记。

上海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后，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关于长沙是否建立过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党史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长沙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毛泽东是以新民学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党的一大，并在大会期间入党。其依据为，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沙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其理由为，毛泽东说：“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而毛泽东是中共一大期间填表，不过是补办入党手续。持这一种观点的文章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关于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毛泽东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而不是召开中共一大的1921年。

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说：“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

二

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1945年6月17日，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又一次引用了这句话，并解释说：“‘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句富有哲理的话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只有几个小组，几十名党员，也没有什么影响。胡乔木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毛泽东介绍中共一大的情况，讲述中国共产党怎样由“简”到“巨”的过程，是要激励人们更加的努力奋斗。他在预备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永远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两天后，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摘自2013年第7期《湘潮》，原标题为《毛泽东谈一大，填补党史空白》）

周恩来节约用盐：为了将来人民不吃苦

□ 曹荣春

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坐立不安，他们在不断加紧对中央苏区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食盐奇缺等困难。

1934年春，红军某部独立营营长杨衍炬奉调从前线回到红军大学学习。他参军前是下肖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跟邓颖超很熟，跟周恩来也不陌生。邓颖超得知他回来，就请他去家里吃饭，顺便了解点前线的情况。

杨衍炬高高兴兴到邓颖超那里做客，却想不到身居中革军委副主席高位的周恩来的饭桌上，竟然只有一碗放了点辣椒的四月梅子、一碗酸菜、两筒子饭。就在他心想自己吃了他们的饭，他们会不会饿肚子而局促不安时，周恩来已经给他盛饭夹菜了。杨衍炬只好吃起来，但他吃了一口菜后不由双眉一皱。他的这点表情变化被细心的周恩来

发现，周恩来忙说：“呵呵，忘了，忘了。”边说边从一节竹筒里倒出小半碗盐水，请杨衍炬把菜沾点盐水下饭，他自己却依然甘之如饴地吃着没盐味的饭菜。邓颖超在一旁看着，只管说这是暂时困难，革命胜利了日子就好过了。

杨衍炬忍不住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你们吃得大苦了，比我们前方战士还苦！”周恩来听了没事似的说：“干革命还能不吃苦？我们现在在吃苦，将来人民就可以不吃苦。”接着他向杨衍炬询问了前方的粮、盐供给情况。杨衍炬回答说：“前方粮食和食盐供应比方好些，因为有后方支援，有时还能直接从敌人手中缴获。”周恩来听了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敌人伸出了两只手，我们也要伸出两只手，一手粉碎他们的军事“围剿”，一手粉碎他们的经济封锁。杨衍炬听了热血沸腾，站起来说：“是！我听周副主席的。”后来，杨衍炬在红军大学学习之余，为当地群众熬硝盐出了大力。

（摘自2019年第5期《党史文苑》，原标题为《周恩来在瑞金的故事》）



陈潭秋：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 徐海波

陈潭秋，1896年生，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湖北区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坚贞不屈。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摘自201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



关于中共一大会场，人们早已熟知，其中的两处：一处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处是浙江省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处是博文女校。当时，为什么要安排在这几个地方，又是谁去安排的？这就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安排这些地方都与她有关。

1919年，王会悟（1898—1993年，浙江桐乡人）从浙江省湖州湖郡女塾（现湖州二中）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这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书记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湖南人李达。当时的李达是中国留日学

王会悟与中共一大

□ 高秀清

生总会代表，回国办事时与女界联合会有密切工作联系。1920年，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是李达。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联系中共一大会场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黑恶势力较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那选在哪里呢？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其建筑是上海最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建筑。上海的石库门建筑采用一进院落，房间主体是两层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其建筑追求简

约，门板不再讲究雕刻。院落大门以石头做门框，门框上边略带花纹，门板取材以黑漆厚木，门板对开两扇，这种门被称为“石库门”。王会悟建议到李汉俊住处开会。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地点开会，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学曹仲彬教授专访了王会悟。当时，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公寓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王会悟对李汉俊说：“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升，以便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李汉俊同意王会悟的建议。于是，中共一大便在这里召开。

联系一大代表住宿

接下来，自然就是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处比较近的地方作为代表住宿处。

王会悟自然就想到了博文女校。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是徐宗汉。博文女校于1916年由黄绍兰与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等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一幢民房创办。当时，汤国梨已经任神州女校（今虬江路四川北路附近）的校长，于是，黄绍兰就担任了博文女校校长，徐宗汉任董事长。后来，由于徐宗汉随黄兴去了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到了困难，单靠收取学费难以维持办学，在这种情况下，博文女校在1920年就停办了。1921年，黄绍兰得到了张謇之兄的资助，又租借了蒲石路（今太仓路127号）住宅复校。二是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中共一大代表开会来回非常方便。当时的蒲石路博文女校距离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住处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王会悟与博文女校联系住宿的名义是：“北京、广东有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要来上海，准备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当时，博文女校正在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转移时代表们“是坐的早班火车去嘉兴的，大家是同一批同一趟火车去的。不过，不在一个车厢，而是分散在各个车厢”。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李达穿着西服呢料坐二等舱。陈公博因在转移嘉兴前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回大东旅店被密探跟踪，故没有去。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是外国人，相貌独特，怕别人认出，也没有去。代表们到嘉兴后，先到县里的张家弄鸳鸯旅馆（现为鸳鸯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早饭后，请旅馆账房给雇南湖游船，原想雇一艘大游船。而大游船需要提前一天预订（当天订不到）。最后只好雇了一艘中号游船。代表们稍作休息，离开旅馆，到南湖烟雨楼参观。11点左右，各位代表到游船上开会。下午6点多会议结束。

最后一天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全国共产党全国领导人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摘自2013年第8期《百年潮》，原标题为《王会悟安排中共一大会场和代表住宿的前前后后》）

